

0221

60751/1.2.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方位 与社会主义选择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 社会主义研究所

1991 年 7 月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方位与社会主义选择

徐 勇

论文提要 本文认为,社会的选择和走向是一定历史时代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分析 20 世纪中国为什么选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帝国主义入侵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构成的国际时代前景,资产阶级无力承担民主革命的领导使命而只能由无产阶级承担的阶级力量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对立竞争中中共争取到历史主动性,是促使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

进入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在资本主义遏制社会主义的世界格局下保持和维护民族独立、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中国仍应坚持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面临新的时代挑战,必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只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加强党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的大发展,20 世纪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将在走向 21 世纪的历程中不断证明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 20 世纪中国,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20 世纪的前 20 年,这一问题迫切地摆在中国人面前。进入 20 世纪后 20 年,这一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可见对这一问题需要加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前些年,有人认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前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基础,走向社会主义似乎是“历史的误会”,只有选择资本主义才是历史正道。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合乎 20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应该承认,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的,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尚很不充分。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肯定经济因素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从不忽视其他因素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任何社会的变革都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社会的选择和走向是一定历史时代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么,要回答 20 世纪的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即由各种因素综合构成的历史方位加以分析。国际时代背景、阶级力量对比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则是促使 20 世纪中国选择和走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

对于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其社会内部逐渐发育生长成熟而自然步入资本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时代背景在其历史选择中似乎不居特殊地位。而在中国,尽管明中叶就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强大的专制国家力量的抑制,这一萌芽的生长十分缓慢,甚至几经挫折。直到 1840 年英军大炮轰开国门,才中断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常规进程,打破了传统的封闭社会结构。与英法等国不同,中国社会的变化不是社会内部自身革命性因素发育生长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入侵引起的。因此,国际时代背景对于中国告别传统社会,走向新的社会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近代中国面临国际时代背景的首要因素，就是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的入侵掠夺，并一步步将中国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资本主义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选择不具有示范效应。

掠夺是资本的天性。外国资本入侵虽然破坏了与外界隔绝这一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客观上造成了传统社会的解体，但这种历史作用是不自觉的，是伴随着赤裸裸的暴力进行的，它给中国留下的是强盗般掠夺和战乱造成的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特别是外国资本出于掠夺财富的需要，与中国社会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结合起来，扮演着维护中国社会腐朽传统的角色。西方资本主义愈是走向东方，其本身的掠夺性与东方专制社会的腐朽性相结合，愈是会显示出其非进步和丑恶的一面。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不仅不佳，而且相当恶劣。1900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正是这种仇恨外国侵略者情绪的总爆发。即使对于那些主张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也经常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而困惑，更为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本国腐朽的政治势力相结合而愤懑，从而陷入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西方强大，资本主义成为理想社会；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与封建势力的结合，要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必须首先获得民族独立，推翻封建势力，这又需要反对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在这样一种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冲突下，使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不能不调整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视角，不再只是一味地向往或模仿之。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使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是以人类陷入极度不平等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和牺牲为代价的。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竞争更为激烈，直至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性。这一严峻的现实使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不能不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即不仅看到其先进性，而且看到其残酷性和不公平性。而后者与深深蕴藏于中国人民心中的人人平等的“大同”理想是格格不入的。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开始探求一条不同于纯粹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西方经典资本主义，而是具有某种社会性因素的资本主义道路。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还是初步的朦胧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失败和随之发生的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结合，则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向往进一步拉大了距离，而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划时代事件更是给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冲突陷入极度彷徨和苦闷之中的孙中山等人以崭新的启示。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显示的人类新的希望，是20世纪中国历史选择面临的国际时代背景的又一重要因素。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突出地表现为它开辟了不同于英、法、美、德、日的社会变革道路，这就是其社会性或人民性特点，预示人类可以以一种尽量减小历史进步代价的方式发展。同时，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与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同，不仅不再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反而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俄国革命终于促使孙中山等人跳出了选择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的窠臼。孙中山提出了向俄国人学习，主张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和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人联合并扶助社会最底层的农工，这表明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孙中山所选择的资本主义蕴含着某种社会主义理想色彩，也反映了20世纪初期国际时代

背景下中国选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某种必然趋势。

二

阶级是阶级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阶级利益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并为社会发展定向。因此，由不同利益要求构成的阶级关系和在阶级斗争中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是影响 20 世纪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

在东方中国，长期的封建历史进程是由于外国资本入侵突然发生断裂的，其结果是中国成了一个畸型的、过渡性的、中间状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社会的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以原有形态延续下来，基本的社会成员结构没有改变，所不同的是由于外国资本的刺激，逐渐生长出一个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到 20 世纪初期，这一阶级已基本形成，并提出了政治社会变革的要求。这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追求。

但是，与西欧国家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缝隙中获得生存发展的，其力量十分弱小。具有强大实力的帝国主义由于自身掠夺的需要，不可能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成长而与其竞争；扎根于广阔乡村的封建主义势力对少数城市资本主义构成强大的抑制力，资产阶级不仅经济力量弱小，而且很难象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逐步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由城市资产阶级和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持强烈反叛态度的城市知识分子、军人等发动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革命果实很快为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势力所篡夺。资产阶级不可能通过强大的国家权力战胜扎根于乡村的强大封建势力，将广阔的乡村纳入城市资本主义体系，将中国导入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

由于力量的弱小，仅靠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而必须依靠占中国人口大多数且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的工人和农民阶级，特别是后者。一方面，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民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另一方面，与少数城市畸型繁荣相映照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城市资本的多重剥削造成的日益衰败的乡村。广大农民的生活异常悲惨，成为受压迫剥削最深的阶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问题的解决，才能使民主革命获得最大动力，取得成功。同时，与西欧国家的农民一直被视为社会的消极性阶级不同，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从古代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到近代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都表现出农民的强烈反抗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民主革命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但屡战屡败。直到去世前不久，他才深刻地意识到，要在中国实现革命性转变必须“唤起民众”，并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

然而，20 世纪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又很难在实际社会发展过程中担负起依靠民众，领导民主革命成功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刚刚由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封建地主官僚转化而来，资产阶级的生存发展不能不求助于政治上居特权地位，经济上居垄断地位的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势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缝隙中求得生存和发展，不仅以最原始的方式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利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剥削分散和软弱的个体农民，与工农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利益对立关系，资产阶级因此很难将工农聚集在自己周围推进社会的革命性转变。就在孙中山告诫本党牢记“唤起民众”的重要性不久，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右派很快发动改变，屠杀和镇压曾支持过他们的工农群众，叛变了国民革命。毛泽东为此评价说：“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①

1927年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无法担当起领导人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中国因此也不可能走向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只能是通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并由此步入社会主义。

这首先在于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革命性强，没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摇性。他们也不同于农民，而是与工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先进阶级。因此，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有能力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

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广大乡村农民不仅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有共同的利益，而且与农民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紧密联系。近代中国的工人大多刚由农民转变而来。近代形成的城乡对立是城市政治统治势力和资本与乡村农民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没有象19世纪法国那样将城市工人与乡村农民隔离开，反而使工农得以联系在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只有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联合和动员决定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基本力量——众多且富有反抗性的农民，实现社会的革命性转变。而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则是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紧密相连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三

历史的选择和走向从来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社会主体在历史给予的客观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结果。20世纪中国之所以选择的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能动作用直接相关。

政党的历史能动作用自然受客观条件制约。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任何政党只有解决这一矛盾，才能成为历史的主导力量。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党主要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它们同时代表着中国的两种选择，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这两种选择能否成为现实，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两大政党能否获得充分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历史能动作用。

国民党是20世纪初期随着资产阶级形成而产生的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的政党。她由孙中山等人创立的兴中会等革命组织逐步演变而成。国民党最初是代表少年中国和近代历史走向的生气勃勃的政党。她领导着中国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延续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试图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是，早期国民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又很难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使命。

这首先在于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十分脆弱和庞杂。本来，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由于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弱小，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决定了国民党一成立其成份就十分复杂。一方面，清王朝被推翻后，帝国主义除扶持军阀势力外，力图对政治声望日渐升高的国民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大批封建官僚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人，试图通过国民党获取利益，国民党内部难免鱼龙混杂，成为不同利益集团聚集的混合体。即使是真正的国民党人，由于政见不同也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国民党成立后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集中的政党组织，其内部派系林立，既有左派，又有右派，即有崇尚议会民主者，又有主张武装革命者，国民党的政治作为因此受到相当限制。

国民党同时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国民党前身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学说，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在民众的响应和支持下，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得以推翻帝制。但是，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并没有获得国家权力，中华民国在名义上成立了，而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平均地权”却难以实现。同时，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与人民群众有着根本利害冲突。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疏远了，由于缺乏民众的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发动的多次反军阀斗争均告失败。只是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才意识到必须依靠工农进行国民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因此大为扩展，其领导的国民革命也获得相当成功。

但是，国民党内部长期分为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紧密联系，与工农大众较为疏远甚至敌对的右派和主张依靠工农推动国民革命的左派。孙中山去世后，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触及到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紧密联系的上层人士的自身利益，引起其极大恐慌和不满。为此，当国民革命由广州发展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时，国民党右派很快发动政变。将枪口对准工农大众，其后果是不仅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而且造就了大批反对者。与此同时，国民党为在全国获得统治权，力图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本国封建军阀地主势力的依附。国民党因而逐步蜕变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代表，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再也难以发挥历史能动作用。虽然国民党获得全国统治权后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只能是具有浓厚买办性、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给社会发展以有力的促进，解决中国大众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反而由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而成为社会政治腐败的催化剂。国民党自身的专制腐败最终导致了她在大陆的合法统治地位的倾覆，向时也宣告了资本主义的选择在20世纪中国的彻底破产。

与国民党由兴盛到衰败和资本主义选择失败相比较的是，共产党的逐步兴盛和社会主义选择成为历史现实。

共产党的成功首先在于她有先进的思想和阶级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的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就站在崭新和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显示出国民党远不可及的生机和活力。首先，中共早期领导人大多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先锋，并接受了反对

资本主义统治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思想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较国民党人要小得多。特别是作为中共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要求摆脱资本的剥削，与当时的压迫和剥削阶级根本对立。因此，中共一建立就是一个革命性相当强和具有统一思想统一阶级基础并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不象国民党那样政治倾向摇摆，派别林立并相互倾轧，中国共产党也就有可能在历史变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共产党的成功还在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制定的共产党纲领道路，因此能够为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广大人民的积极认同。这也是中共成立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很快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所在。特别是1927年国民党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定中国革命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农村这一中国底层挖掘封建主义根基，实际推行孙中山提出过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其社会基础大大扩展，也为共产党的成功提供了基本条件。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为此评论说：“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②

而在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危机中，与国民党步步退让相映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不仅得到广大工农的拥护，而且为众多社会阶层所支持，其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同时，在中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处于被围剿被压迫的地位，争取民族和人民解放目标的感召，以及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在社会变革中一直扮演着为民族和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角色，与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国民党获得国家政权后日益走向专制腐败，丧失人心形成鲜明对比是共产党发展迅速，大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当国民党因自身腐败其统治地位很快倾覆时，中共领导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成功，并通过新民主主义道路步入了社会主义。

四

国际时代背景、阶级力量对比和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能动作用等因素，决定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的必然选择而不是“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在中国建立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出的相当吸引力的事实，也证明了20世纪中国对社会主义选择的合理性。

然而，世事沧桑。当社会主义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外部世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失误和曲折，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动乱。于是，进入20世纪后20年后，有关20世纪中国是否应选择社会主义，这种选择是历史必然还是历史误会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走向是否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前文已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地选择了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

取得了巨大成就，也曾出现了重大挫折的 20 世纪后半期，中国仍应继续坚持社会主义。

首先，尽管世事沧桑，但以资本主义为轴心的世界格局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掠夺天性并没有改变，只是其掠夺的方式有所变化而已。而且，自从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问世以后，资本主义就一直推行遏制社会主义的战略，以维持其世界轴心地位。在这样一种世界格局下，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保持其民族独立地位，不致于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新的附庸。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不只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与民族独立紧密相连，如果放弃社会主义，使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民族独立地位极易动摇，甚至陷于民族分裂和社会动乱，中国的发展也就会失去最起码的基础。

其次，政治独立和社会发展建立在经济独立和经济发展基础上。中国是在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度里实现社会变革的，要巩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革命成果和启动社会现代化进程，必须走一条通过国家的力量迅速积累人力物力资源，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道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并能够为广大人民积极认同的社会主义显然较自发的资本主义更有条件实现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刚刚起步，能够广泛动员和集中人力物力资源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现代化建设的“重力推进器”，中国也才有可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再次，实践证明，具有社会性、人民性的社会主义不失为一条有可能尽量减小人类进步的代价获得社会发展的道路。在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转变的三种模式的国家，都曾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英国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美国充满刀光剑影的西部开发史和对有色人种的长期歧视，德国和日本不约而同走上法西斯道路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以及各资本主义列强对落后民族的强盗般掠夺。社会主义道路则有可能使人类避免过高的进步代价。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了失误和曲折，人民也为之付出一定代价，但即使如此，每个人都能获得生存发展，即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和“共同富裕”的基本事实和价值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并没有否定和动摇。这说明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它独特的魅力。既然如此，无论从历史抑或人道的尺度，都不应对社会主义予以简单的否定和轻率的摒弃。

如果说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是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历史选择的话，那么，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则是 20 世纪下半期中国的历史选择。这是因为，20 世纪后期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即所处的历史方位毕竟有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除了进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人们的历史感，在思想上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外，更重要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使社会主义信念得以持久巩固的条件，也是决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关键。

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最根本的在于它能够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一般来说，社会主义优于和高于资本主义。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而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在当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竞争的格局下，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后半期，长期为中国人所痛恨的资本主义和在大陆曾声名狼藉的国民党的形象之所以有所改变，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0 年代上半期，我国在实现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的同时，经济也得到了很快恢复和迅速发展，其国际地位和吸引力大为提高。但 1957 年发生了极少数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情况而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国将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受到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国家经济得以起飞的 60 年代，由于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的变化的影响和对本国经济恢复中暴露出的问题的估计有所偏差，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将我国与发达国家正在缩小的距离再次拉大，失去了极为宝贵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时间。80 年代的最后一-年，中国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在这历史发展又一关键时刻，中国除了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更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社会愈是发展，这一问题愈加尖锐。前文所述，社会主义有可能尽量减小人类进步的代价，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尽可能实现社会平等。但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平等往往被理解为人人都必须获得同等的成果而不必考虑他为社会作出了多少贡献。片面追求结果平等和过多的社会福利。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致命之伤。所以，社会主义必须改变微观社会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不断调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必然会影-响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格局中所应有的竞争力。

发展社会主义还必须加强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成为现实并得以向前发展的。共产党领导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特别是在当今共产党执政并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与国民党执政并实行资本主义的台湾长期并存的格局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尤显重要。

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保证党始终沿着经过历史检验是正确的路线，即党在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次是保持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将使党永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与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建设，作为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在国家直接控制经济和民主监督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党与人民的关系由密切到疏远的危险大为增加。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对此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只是在怎样防止这种危险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出现了重大失误。80 年以来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共产党人走向蜕变腐败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将长期经受着执政的考验，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命运在相当程度取决于执政党建设。

尽管当今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加强执政党建设，由此促进社会主义的大发展，那么，20 世纪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将会在走向 21 世纪的历程中不断证明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非“历史误会”。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35 页。

②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81 页。